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K250.6

1

2:12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

(內部發行)

B640.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79年3月

A·630287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1/4
1979年4月第 一 版
197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11103·27

定 价: 0.58 元

编 辑 凡 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工作总则第十条规定了“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任务，因此，本选辑的刊印，目的就在于广泛积累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特别是与本省有关的史料，并借以促进史料征集和撰写工作的开展。选刊的稿件，我们力求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身见闻，并要以存真、实事求是地反映史实和人物等情况，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本选辑只在内部不定期印行，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选辑的资料，从戊戌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历史时期事实为限，凡政治、经济、军事、工商、民族、宗教、华侨、科技、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尚等历史资料，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资料，来稿只要有史料价值，均所欢迎。

三、欢迎阅者对“选辑”刊登的资料，及时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以综合、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西安事变前后

.....何柱国(1)

西安事变亲历记

.....汪日章(15)

抗日时期鄞西地区武装斗争的一些回忆

.....毛 尹(32)

蚕学馆——中国第一所纺织学校

.....朱新予 求良儒(51)

辛亥革命前后浙江选举轶闻

.....张任天(58)

蒋鼎文其人其事

.....文 史(62)

浙江汉奸省长丁默邨

.....黄庆中(80)

任芝卿与衢州教案

.....翁楚望 崔千志(93)

回忆宁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倪德昭(113)

赴美考察基督教青年会记

.....倪德昭(132)

宁波资本主义工商业简史

.....原宁波市政协文史工作组(137)

民生药厂创办前后

.....孙延年(153)

牛春明与太极拳

.....顾启欧(173)

湖州羽毛扇

.....邱寿铭 朱彦孙(188)

订正与勘误

.....(191)

专载:

关于广泛征集、编写革命史料工作意见

.....(193)

西安事变前后

何柱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已四十二周年。这次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个比较重大的转折点，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这次事变中，作者因始终亲历其境，事隔四十二年，记忆犹新，特别是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当年受毛主席、共产党的委托，身历艰险，排除困难，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任务，令人无限钦仰。还记得一九五六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敬爱的周总理打电报给我，叫我去北京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纪念会，总理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再次肯定了西安事变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在招待的宴会上，我被安排在总理的座侧，总理频频为我挟菜，此情此景永留在心中；转眼又是二十二年过去了，敬爱的总理与世长辞快三周年了。我感到总理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蒋介石石家庄之行

“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我率领部分东北军在山海关对日寇进行了一次阻击战，被迫退回滦河。部队被改编为五十七军，任我为军长。不久蒋介石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我的部队又退驻石家庄。一九三三年三月初旬某一天，蒋介石与宋子文来到

石家庄与张学良晤面，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亲自率领东北军反攻热河，收复失土，欲藉此一洗不抵抗之恶名。蒋介石却说：我们现在的局势好比风雨同舟，在狂风逆浪中必须有一人下水，否则将同归于尽。问张学良应该怎么办？张学良说：如果局势真是如此，那我就首先应该下水。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转向宋子文说：“汉卿很能顾全大局，那就让他休息一下吧。”这是蒋介石专程来到石家庄的目的，盖在全国舆论譁然的情况下，要张学良承担不抵抗之恶名，做他的“替罪羊”，以和缓国内外舆论之指责。此乃张学良不得不离开东北军下野出国之内幕。

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时，东北军还有二十六万多人，除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三个军约计九万多人以外，其余十七万之众交于学忠统率。实际上当时东北军之调动指挥，已完全听命于蒋介石。

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与红军作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李济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张学良乘此机会由意大利回国，蒋介石先任之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继任之为武汉行营主任。此时我的部队已被调驻鄂东之宋埠麻城一带。一九三五年十月，蒋调张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进驻西安，迫其指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陕北红军作战，这是违背东北军的意愿，违背张学良回国的意图，东北军心里无一日忘记打回东北，收复失土，重整家园。张学良与蒋介石对内政策之不合，张氏并不讳言，东北的军心民心，蒋介石也不会不了解，但他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驱使东北军与红军作战，胜也好，败也好，败了亦可藉此达到瓦解东北军之目的。这便是西安事变前夕，东北军与蒋介石矛盾所在。

张学良赴延安，商定团结抗日

西安事变之发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东北军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因此而导致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张学良调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以后，与红军打过几次仗，被迫上阵，士气低落，当然也不会认真作战，在酃县的直罗镇，黑水寺与红军接触，两个师都被击溃，红军把俘虏的人马与武器都送还东北军，并对东北军宣传团结抗日的大道理，指出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就是要瓦解消灭东北军，东北军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抗日反蒋。这些宣传，张学良是听得进的，对东北军的影响很大，这也是促成西安事变的重要因素。当时王以哲驻军洛川，经张学良的授意，就与红军进行了秘密联系。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张学良曾秘密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取得了停战的谅解，商定共同抗日；并约定互派代表经常进行联系与协商，当时东北军派的与红军联系的代表就是王以哲，红军派的代表，是吕正操同志。这件事在“双十二”以前，都是极端秘密的。以后十七路军杨虎城也与红军订立了同样的协议，就是彼此停战，物资交流，互派代表。因此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以前，前线已经无战事，东北军与红军化敌为友，双方约定枪口对外不对内。

因为有以上两个因素，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裂，已是势所必至。张学良平日与身边将领的谈话中透露出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尽力说服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第二种想法是如果说服不了，只有只身引退，辞职不干。这两个想法都是不现实的，辞职不干，离开东北军，东北军将领都不会同意的；至于说服蒋介石放弃打内战的政策，事实证明是与虎谋皮。

张学良三次向蒋介石进谏，均遭斥责

一九三六年八月，蒋介石用分化瓦解、威迫利诱的办法，平定了广东反蒋事变后，立即回师，向平汉线、陇海线调集大军，向西北进逼，他自己以避寿为名，飞到洛阳坐镇。张学良从西安赴太原约阎锡山同去洛阳为蒋祝寿，乘此向蒋进言，说明军心民心都厌内战而要求抗日，说形势紧迫（这年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陆军少壮派杀死了滨口首相和几位大臣，少壮派得势，大举侵华已箭在弦上），与共产党必须息兵言和，协力以抗日。蒋介石却断然拒绝，这是张学良第一次进谏失败了。第二天上午，我随张学良去洛阳军分校听蒋介石对该校学员训话，蒋说：通日本的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张闻之神情紧张，面为改色。回西安时在飞机上，张对我说：“今后我干什么，谁也不知道，连我老婆也不知道”。并叫我尽快将东北军改编方案及编制表完成交给他。半个月后，张学良又以请蒋审批东北军编制方案为名，第二次向蒋陈词，说明东北军要求抗日复土，军心浮动已无法说服，请蒋亲自去向东北官兵训话，进行安抚。蒋当时答应去临潼约见东北军将领，加以晓喻；同时还向张学良提出两个办法，要张抉择其一：一个办法是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调到陕北前线，向红军发动进攻，由中央派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由“中央军”负责“进剿”。这两个办法，张学良、杨虎城当然都无法接受，因为这样办，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将会与十九路军同一个命运，被分裂瓦解，以至消灭。这是张学良第二次进谏又失败了。蒋介石从洛阳到临潼，张学良、杨虎城曾请蒋介石到西安赴宴，席间向将领们讲话，蒋介石可能由于心虚胆怯，拒绝前去。十二月七号下午，张学良又去华清池作最后的净谏，说明共产党之政策是抗日第一，国共两党之争可通过政治

方式解决，说明官兵抗日情绪高涨，已无法遏制。两人争辩达两小时以上，张学良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拍桌斥责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煽惑宣传；并怒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的安内政策也不会改变”。这是最后的一次谏诤也失败了。除兵谏以外，已别无他策。张学良回到西安，把与蒋介石争辩的情况告诉了杨虎城。

张、杨发动兵谏，活捉了蒋介石

这些时候，蒋介石的军政大员云集西安，准备举行一次重大的会议。十二月八号上午，张学良在家请客，客人是刚到西安的蒋百里。蒋百里是军政界的老前辈，张学良对他很尊重，陪客中只有张学良身边几个亲信王以哲，孙铭九等，我也在座。席间张学良谈到向蒋进言的情况，谈到东北军不愿打内战，也谈到国家民族前途，日本亡我的野心。蒋百里很同情张学良的处境，也赞赏张学良的见解，但对如何说服蒋介石亦无善策。十二月九号那天，北风凛冽，寒冷异常，西安各学校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上街游行，到张学良司令部及陕西绥靖公署杨虎城司令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又要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知，电话张学良立即制止，如果不听劝阻，可以调动武装军警。张学良接电话后，即亲自驾车去追赶，追到灞桥，劝学生们回来，学生们不肯回转，张学良气愤地说：“你们回去，三天以内我自有办法”。张学良把游行队伍劝回以后，就将城门关闭。张学良与杨虎城经过秘密协商，于十一日夜間，布置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警卫团团长孙铭九，带领武装，于拂晓前赶到华清池，先礼后兵，迫使蒋介石来西安共商军国大计，并吩咐他们要注意蒋的安全，避免武装冲突。白凤翔等，十二日早晨五时左右到达华清池，就受到蒋介石守卫部队的开枪阻击，双方即发生了短距离接触。钱大钧负伤，蒋

孝先当场被打死，蒋介石从梦中惊醒，由后门逃匿山中。这时张学良、杨虎城、邓宝珊、马占山以及我们东北军几个高级将领，都在杨虎城家客厅里等候消息。张学良在客厅中来回走动，神情极为紧张。当从电话中听到孙铭九报告，说蒋介石从卧室里逃走了，正在搜索。张学良听了，用手拍拍脑袋说：“如果他真地逃掉了，一定马上会发兵来攻打西安，势必引起更大规模内战，如果出现这种不幸局势，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割下我的头来，请杨虎城将军送往南京以了此案。”上午七时左右，孙铭九又来电话，说蒋介石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命令立即把蒋介石护送来西安。上午九时，蒋介石被送到新城大楼暂时住下。这时蒋介石身上穿的还是睡衣，脚上也没鞋子，由杨虎城守护新城大楼的宪兵和副官，拿来一套新的衣服鞋袜给他穿上。当时大家商定先推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去见蒋介石，向蒋解释此次行动之目的。蒋虽精神萎靡，但怒气满面，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张学良一个人去见他，进去时张学良说：“委员长受惊了！”蒋大声说：“你还叫我委员长？”张说：“我们还要拥护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蒋说：“你们既要拥护我打倒日本，你就马上送我回洛阳去。”张说：“以后一定送委员长回洛阳。”其他什么话也没有谈，张就向蒋敬礼告退。蒋介石被扣后，张学良始终以礼相待，对蒋并无一点粗暴言行。蒋在新城大楼住了两天，张学良考虑到新城大楼是杨的警卫区，并已听到扬言，杨虎城的部下有人要杀掉蒋介石。为了蒋的安全，必须另移住处，如果搬到张学良公馆与张同住，也有不便，万一有事，会影响到张的本身安全。经过研究，把张学良公馆对面高桂滋的公馆打扫好，作为蒋介石的住处。十三日夜里，张学良派孙铭九去接蒋介石到高桂滋公馆，孙铭九见蒋介石说：“住在这里不方便，副司令准备了一个好的地方，请委员长搬到那里去住。”蒋介石看到孙铭九胸插左轮枪一支，且在深夜，误认为要枪毙他，身子有些发抖，嘴

里打着哆嗦说：“我就住在这里，什么好地方也不去，死也就死在这个地方，”睡在床上不肯起来。孙铭九一再向他解释，副总司令对委员长毫无恶意，搬个地方比较便于照顾保护，代他穿好了衣裳，扶上了汽车，送到高桂滋公馆住下，由张学良的警卫团负责警卫。

专机迎接周恩来副主席到西安共商军国大计

蒋介石被扣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一些将领们，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意见并不是都一致的：张学良的兵谏，是想用霹雳的手段来强行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说服不了怎么办？就是蒋介石被迫口头答应了，以后又反复背信怎么办？张学良心无定策；而杨虎城所部一些军官们主张一不做二不休，乘此杀掉蒋介石，以免后患，杨虎城本人对此亦不表示反对。蒋介石被扣后，全国震动，各省实力派纷纷打电报给张、杨，这些电报大部分我都看过：有的是问张、杨何以善其后；有的是坐山观虎斗；有的是赞扬鼓动；但无一主张联共者。张学良却有一点想法始终是明确的：他认为不论是倒蒋抗日或拥蒋抗日，都必须联合共产党一致行动，他与共产党不仅早有默契，而且签订过团结抗日的协议。为了与共产党面商大局的对策，十二月十五日就派出专机飞赴延安，十六日中共中央就派出了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到西安。叶剑英委员长也是当年这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周副主席到达西安时，张学良、杨虎城都亲往机场迎接。周副主席走下飞机时，张学良迎上去亲切而轻松地说：“美髯公，你的胡须呢？”周副主席笑笑作个手势说：“胡须剪掉了。”在旁其他人听之颇为惊讶，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学良与周副主席早已相识，这是第二次见面了。

在周副主席的伟大感召下

周副主席到达西安时，不仅张、杨内部意见纷纭，外部也很

乱：南京已派飞机来西安上空进行威胁，空气紧张，人们认为战事已迫在眉睫，市民大量外逃；蒋介石的文武大员麇集西安者除少数人如蒋百里、邵力子等人外，都全被软禁，而有些所谓知名人士，社会名流，政治骗子、汉奸、野心家也来到西安，兴风作浪，挑拨离间，希望把局势搞乱，愈乱愈好，以便从乱中捞取好处。因而谣言很多，公开喊出“打出潼关”，“杀掉蒋介石”。杨虎城公馆中进进出出的这类人物很多。他们既主张杀掉蒋介石，也反对共产党。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周副主席来要完成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这样关键时刻，一着之差，即可铸成历史大错。而周副主席来到西安，终于取得了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和平解决了这次事变，形成了抗日的局面。这种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永标史册的。

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首先对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向我们作了深刻的分析；并高度赞扬了张、杨这次行动。他说：张、杨两将军这次行动，是体现了人民反蒋抗日救国的愿望，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他说：中共代表团这次来，就是要把一切爱国的力量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这次来西安，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和大家商讨团结抗日的大计。他指出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绪高涨，国民党内部也不完全都是投降卖国的；英美帝国主义由于本身的利益也不会坐视日本独吞中国，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正在加深。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条件、有可能、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逼使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争取他共同抗日。周副主席接着就提出必须和平解决这次事件，强调：“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经过周副主席对形势的分析，有很多人思想比较冷静了，逼使蒋介石一同抗日的信心也提高了；张学良也更加精神焕发了。但是也有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一是对逼蒋抗日无信心；二是对蒋介石不放心；三是另有那么些人有野心，想乘乱

捞一把。有一天周副主席约我们到杨虎城家里去进行说服工作，十七路军的某个高级将领就气势汹汹地说：“这件事不能完全听共产党来处理”，还有人大叫“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不能放虎归山”。周副主席为了要处理另一项重要工作，就离开了会场。因为这时有一部分红军部队开到了渭河北岸和西安附近三原，协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防堵国民党部队进攻潼关。周副主席亲自去布署指示。周副主席离开以后，杨虎城说：“谈僵了，怎么办？”要我去把周副主席请回来。我说：“要我去请他回来可以，但是必须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团结抗日的主张，如果不接受他的主张，请他回来谈什么呢？”张学良也叫我去，认为只要我们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就可以保证对蒋介石谈判的胜利。我去三原把周副主席请回来了。周副主席一来，就对杨虎城说：蒋介石现在抓在我们手里，要杀蒋介石还不容易吗？只是一句话就行了；但是杀了蒋介石后果如何呢？他下面还有很多小蒋介石啦，都杀得光吗？周副主席还打了个比喻，他说：我们这次捉住蒋介石，和苏联十月革命逮捕克伦斯基不一样，也和普法之战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把他囚禁在一个荒岛上不一样。今天我们虽然拿住了蒋介石，他的实力依然存在，杀了蒋介石，必然要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也是国民党内亲日派所希望的。这将为我们国家民族造成更大的灾难，这决不是上策。敌人所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决不能做，要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听了周副主席的话，大家都极为感动。一个曾经主张杀掉蒋介石的军官，也不得不佩服周副主席的眼光远大，共产党的气量宽宏。这个军官说：“要讲仇恨，共产党与蒋介石的仇恨最深，光是十年内战也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共产党不计较历史恩怨，以大局为重，真是叫人钦佩得五体投地。”他说完还对周副主席行了一个军礼。将领们的思想澄清了，意见统一了，这完全是受到周副主席伟大的政治气魄和远见，崇高的

风格的感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军事上又对张、杨作了指示和布置，准备好随时迎击南京亲日派何应钦的“讨伐”，防备出现意外的局面。

周恩来副主席除做军人工作以外，对社会人士，对青年学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参加各种会议，做报告。青年学生开大会欢迎他，他对学生讲完话以后，学生们围绕着他高呼：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共产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大大提高了。周副主席来到西安时，本来就很清瘦，这次在西安住了两个多月，日夜劳累，不停地工作，人更瘦了，说话的声音也嘶哑了。这种一心为国的忘我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周副主席到西安时，张、杨招待他住在张学良准备的招待所靠近张的公馆，以后移住七贤庄，离张学良的公馆也不远，这个地方就是红军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周副主席搬到红军联络处。我去看他，见他住的房间很小，除了几张椅子，一张桌子，一只单人床以外，什么陈设也没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生活作风如此简朴，也是历史上少见的。

周副主席到西安后不久，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也到了西安。宋氏兄妹作为蒋介石的代言人，首先与我们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周副主席坚持原则，始终是根据中共十二月十九日发出的通电精神和张、杨十二月十三日发出的对时局宣言所提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这八项主张是：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②停止一切内战；③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④释放全国政治犯；⑤开放爱国民众运动；⑥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⑦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⑧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在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个大原则取得意见一致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陪同周副主席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进入蒋介石的房里，周副主席有节制有礼貌地说：“委员长受惊了”。周副主席从中山先生革命遗教谈

起，归结到当前民族危机严重，国势岌岌，指出十年内战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与痛苦，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抗日，坚持内战，只有自速灭亡。义正辞严，终于折服了蒋介石，取得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虽然蒋介石说什么不在文件上签字，以“领袖人格”作保证。周副主席认为签署文件不过是一种形式，也就没有坚持，原则问题取得一致就行了。谈好以后，周副主席、张学良、杨虎城也就答应第二天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被终身监禁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未经与部属商量，也没有告诉周副主席，秘密地亲自伴送蒋介石与宋子文、宋美龄同机飞往洛阳。周副主席得到报告，立即赶往机场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了。这是张学良的失着，没有估计到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以致从此，离开了东北军，失去了自由。

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即以“劫持主帅”罪名受到军法审判。据说当他被摘去佩剑，带进军事法庭时，激愤万分。大声说：“我一个人也要革命，死了也不忘记抗日”。军法审讯结果：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事实就是禁锢终身。这个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将士悲愤万分。刚刚平静下来的局势，又沸腾起来了，今后东北军何去何从，谁来统率，如何挽救张学良？在这个问题上，东北军将领之间在意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政治掮客、汉奸、亲日派，又从中煽动。东北军将领由意见的分歧，很快就形成了对立：以少壮派军官孙铭九、何靖华等为首的一些将士，提出要用武力解决，喊出“打出潼关去，救回张学良”，要和蒋介石拚到底；王以哲、何柱国老一派将领，力主持重，不可轻率行动，认为轻率动武，不仅破坏了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也救不了张学良，结果还断送了东北军，造成大乱。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当时所处的地位本可起到说服制约的作用，但杨本人